

张作霖“宁可少养兵，也要搞教育”是伪史

导语：张作霖对东北大学从未给予资金上的特别支持。其对初等、中等教育的态度，亦大致如此。

近年来，网上一直有文章流传说，张作霖统治东北期间，重视教育发展，规定各县每年教育经费要占财政支出的40%，甚至有“宁可少养五万陆军，也要办东北大学”之语。

事实上，在张作霖眼中，最重要的从来都是充足的军费，教育经费很少在其考虑范围之内。

张作霖统治东北，教育经费连年减少，时人抨击张“摧残教育”。

张氏父子主政东北时期，东北的中学、小学数量都有明显增长，并有东北大学、冯庸大学等高等院校出现。但有两点需要注意：1、这些学校很多为私立学校，经费不来自奉系统治下的四省政府；2、学校数量的大幅增加，主要发生在张学良当政时期。

自1911年~1920年，奉天的教育经费逐年递减，且状况并未随着1916年张作霖上台而发生改变。1920年，奉天省各省立学校校长，听说省议会要将当年教育经费再“核减一成”，曾联合上书省教育厅厅长谢荫昌，诉说奉天教育经费一减再减之惨痛历史：“由民国元年以来，迭经核减，已达极点……若

再减一成，困窘立形，诸事何能再办……”①1926年，甚至有东北省立学校校长因教育经费迟迟拖欠，愤而辞职。②

奉天教育经费不足，在当时众所周知。1925年，郭松龄在讨奉檄文中，开列张作霖罪状，第一条即是抨击其“摧残教育”。檄文称：“清季兴学伊始，奉天省立学校经费，每年共合银一百二十万两，……(张作霖当政后)因增兵之敛，将省校经费，减至奉票四十万元，与清季较，尚不及一与十之比例。……遂至教育腐败，学校日衰”。郭松龄提出的改革奉天政治的重要计划之一，即是“增加教育经费，实行强迫教育”。③

奉天教育经费仅占全部财政支出的3%，东北大学筹建极为困难

今人常错将民国东北高等教育(主要是东北大学)的成绩算在张作霖头上。

张作霖同意筹建东北大学的前提是“不使军费受牵制”

1921年，奉天省教育厅厅长谢荫昌向张作霖建议：“欲使东北富强，不受外人侵略，必须兴办大学

教育，培养各方面人才”。但身为蒙疆经略使的张作霖，对筹办大学之事并不热心，始许诺拨款15万元，最终却只筹得3万多元，以致谢荫昌一度想先建“东北文科大学”，未来再使之成为综合性大学。④

转机发生在1922年。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，被迫闭关自守。为留住王永江为其继续管理奉天财政，张做出重大让步，在民政事务上给予王永江更大的自主权。⑤王永江趁机向张作霖建言，“欲使东北富强，必须发扬文治，广罗人才，改革军备”，并承诺筹建大学“另有底款，不使军费受牵制”⑥，终于使张作霖同意在东北发展高等教育。

王永江向张作霖承诺“另有底款，不使军费受牵制”，自然也是因为他深知：张作霖绝不愿牺牲军费去办理教育。

东北大学筹建期间，张作霖并未给特殊支持，以至经费要东拼西凑

筹建东北大学，首要难题就是资金匮乏。东北的绝大部分财政收入都被划归军费。如奉军1922年的军费开支为2040万元，相当于

奉天省全年支出的81%⑦。1923年，在王永江的努力下，奉天省财政状况好转，全年收入2678万元，支出1823万元，其中军费开支占76%(1394万)，但划归为教育经费者，仅占3%(63万元)⑧。王永江只能靠着这极有限的教育经费来发展东北的高等教育。

经费严重不足，身兼奉天省财政厅厅长的王永江，只能左右腾挪、拆东补西。为筹集修建校舍的经费，王永江甚至把奉天专门文科学校(学生并入东大，成为最早的文科院系)的校址标价卖出。即便如此，资金仍是有限，初建的东北大学校舍，普遍简陋，除新建了一座稍气派的理工大楼外，余者宿舍、食堂等，全都相当低矮⑨。

略言之，张作霖对东北大学建设，从未给予资金上的特别支持。其对初等、中等教育的态度，亦大致如此。东北大学的建设，应主要归功于王永江的各方筹措。1927年，王永江去世，临终前夕，“犹念念未见东北大学毕业生为憾”。后来莫德惠代理奉天省长，东北大学经费仍需其利用个

人关系“尽力筹足，俾得积极发展”⑩。

所谓“张作霖重视教育”，不过如此。

注释

①辽宁省档案馆编：《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6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，第532、533页；②朱庆葆，陈进金，孙若怡等著：《中华民国专题史第10卷 教育的变革与发展》，南京大学2015年，第98页；③《敬告东三省父老书》，《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郭松龄反奉》，第167—170页；④⑤王妍：《东北大学早期校园建设研究(1923—1931)》，东北师范大学2016年；⑥(美)薛龙：《张作霖和王永江：北洋军阀时代的奉天政府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，第77、78页；⑦李宗颖：《略述东北大学》，《辽宁文史资料第8辑》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，第65、66页；⑧满铁调查课：《东三省财政纪要》；⑨(英)加文·麦柯马克：《张作霖在东北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，第97、98页；⑩莫德惠：《双城莫德惠自订年谱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，第42页。

毛泽东去世后“四人帮”何动作引起华国锋警觉？

“又是一个一号文件。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。真是得势更猖狂。来得快、来得凶，垮得也快。”

这是张春桥于1976年2月3日留在日记上的一段话。

其中提到的“又一个一号文件”，是指“经毛主席提议，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，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”；“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”，是指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。两个一号文件仅隔一年，其间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张春桥如此仇视和咒骂，实际上是“四人帮”的不满和失望。同时，他们也盼望华国锋“来得快、垮得快”。

一直在毛泽东家乡湖南做地方工作的华国锋，与“四人帮”并无太大的矛盾。华在担任副总理期间，尽管双方没有走到一条道上，但也结怨不深。但“四人帮”为何这般痛恨华国锋，只有从逻辑的角度才能说明问题，那就是：华国锋的扶摇直上，挡住了“四人帮”实施夺权的道路。按“四人帮”的逻辑，谁挡道，谁就是敌人。

华国锋上台，可谓是在危难之际。年初，总理刚去世；不久，朱老总又去世；更关键的是，毛泽东身体也不好。“四人帮”希望华国锋垮得快，那是他们抢班夺权的步伐在加快。

1976年9月9日，毛泽东去世。9月12日凌晨3时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报告华国锋：王洪文秘书去电话，让有事直接与他联系。张平化在电话中念了这一条通知：

“中办米士奇同志来电。湖南省委：中央领导指示，在主席丧期发生问题要及时报告，凡有

重要问题不好解决要及时请示中央，可直接找米士奇联系。9月11日上午9时。”

请示中央？请示哪个中央？毛泽东在去世之前，已任命他为第一副主席、总理，主持中央工作。听到他不知道的通知，华国锋非常警觉。

紧接着，便是清理主席的文件。主席一去世，江青就找张玉凤要主席保险柜的钥匙，并拿走了几份文件。到底由谁来清理主席的文件？华国锋找到汪东兴，让汪将此事管起来。

9月19日，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，要求召开政治局紧急常委会。华问为什么要开紧急常委会，江青说：“先不要问。”谈起开常委会的人员时，江青不让被强迫病体的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，而是让她和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毛远新参加。此事可谓荒唐：作为中央第一副主席、政治局会议主持人的华国锋居然不知会议内容，也决定不了常委会的议程！

紧随其后，江青不断以死人压活人，为保存遗体、保存文件、保留毛远新留京工作等一直同华国锋等人纠缠不清。在江青眼中，早已没有中央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第一副主席。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就这样打响了！

10月2日，华国锋再也沉默不住了。当天，他在审阅外交部长乔冠华在联大会议上的发言稿时，突然发现过去毛泽东给他的“照过去方针办”变成了“按既定方针办”。毛主席“既定”了什么？他联系到江青一直在要毛主席文件以及其行径，马上作了批示：“此发言有误。文中引用

毛主席嘱咐，我查对了一下，与毛主席亲笔写的三句话(不符)，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‘照过去方针办’。为避免再错传下去，我把它删去了！”

据耿飏回忆，华国锋亲口对他讲：毛主席没什么“临终嘱咐”。不应该这么说。他们(“四人帮”)这样做，就可以把他们干的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，都说成是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了。他们就得了政治资本了嘛！

华国锋的批示无疑是敲山震虎。但事隔两日，“四人帮”控制的《光明日报》又发出了《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》的社论，言称：篡改毛主席既定方针，就是背叛马列主义、背叛社会主义、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。公开叫板华国锋。

同时，“四人帮”经过密谋，又把手伸向毛泽东第五卷文稿。“四人帮”清楚，华国锋用毛泽东的嘱咐打击他们，他们必须以其道还击。要用毛泽东的话来还击，他们就必须要拿到正在编辑的毛泽东文稿。

有人马上将此事向汪东兴汇报，汪东兴也感到这是“四人帮”向中央夺权的信号，便建议华国锋采取行动……

1976年9月21日晚，华国锋利用在中南海值班之际，决定到北京医院一趟。然后，他让车在北京医院绕了一圈，随即直奔西皇城根李先念的家。

华国锋过去与李先念比较熟悉。当年李先念在中央工作，华在地方工作，双方比较配合。在中央政治局共事也一直配合默契。毛泽东去世后，华国锋给李先念看了毛给他留下的“按过去

方针办”、“不着急，慢慢来”和“你办事，我放心”的手迹。在华受“四人帮”为难之时，李先念让华国锋领头与“四人帮”斗争，并表明自己和其他同志支持华国锋的态度。另外，华国锋知道李先念与老师们的关系比较好。他选择与李先念商量议事，是用了一番苦心的。他知道与“四人帮”斗争，必须要争取德高望重的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支持，而只有李能将此意图传达给叶帅。所以，他到李家后单刀直入：

“形势紧迫。看来，我们同他们之间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。‘四人帮’的问题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。我想请你请示一下叶帅，‘四人帮’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好？采取什么方式解决好？这是一件大事，我想知道叶帅的意思。”

“你下决心了吗？”李先念问。“现在不能再等待了！”华国锋说，“情况太紧急。问题是以任何方式解决，需要认真考虑一下。”华国锋再次陈述了毛泽东的遗志：“主席生前就交待过，今年不解决明年解决，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！”

“好！”李先念很高兴华国锋这个态度，“国锋同志，你下决心就好！我马上去见叶帅。”

1976年9月24日，李先念出城前往西山叶剑英住处。

在任命华国锋的第一号文件上，还有一句话就是叶剑英“因病休息”，由陈锡联主持军队工作。实际上，叶剑英是因同邓小平一起反对“四人帮”而被迫病休。叶剑英在西山无病也不需休息，他积极参加中央的活动，时刻关注着国内外动向。

当李先念一到西山，叶剑英

就问：“你是奉命来的吧？”

叶剑英打开收音机，李先念说明来意，在叶的耳边说了一句话：“江青把华闹腾得无法工作，要逼上梁山啊！”接着，他讲了华国锋思考的两个问题，请叶剑英拿主意。

叶剑英马上阐明态度：“我们跟‘四人帮’的斗争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，要当机立断！”

“是啊！”李先念的态度也很明朗，“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！小平同志被他们打下去了，如果我们再被他们打下去，他们就要夺取最高领导权了！”

叶剑英说：“事已至此，那就不能再拖了，要迅速采取行动，要以快打慢，最好一两天就行动！”

叶剑英就许多想法请李先念转告华国锋，并决定马上与华见面。

第二天，叶剑英冒着风险来到东交民巷15号华国锋的驻地，与华国锋详细研究了采取措施的方案。

笔者查阅了粉碎“四人帮”的许多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，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即华国锋、叶剑英和李先念在策划期间均未集体碰面。可以看到的脉络是，华国锋找李先念，李先念找叶剑英，叶剑英找华国锋，然后又单线往复接触数次，再又分别找汪东兴和其他人反复商议，最后确定了起事和起事的方式及时间。

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。最后在抓捕成功后，华、叶和李才在政治局会议上统一碰面。但不管事情多么曲折，有两个标志性的往来很清楚：即华向李透出请叶拿主意的信息，另外是叶到华家确定起事的环节。这是几位谋主推动起事的关键细节！